

莫扎特和贝多芬

□张无极

法国导演埃里克·侯麦的《从莫扎特到贝多芬》,如同一位智慧的引路人,带领读者漫步于音乐历史的殿堂,深入探索从莫扎特到贝多芬这一时期音乐艺术的发展脉络与内在变革。这本书不仅仅是对两位音乐巨匠的简单传记,更是对音乐风格转变、时代背景影响以及艺术创作本质的深度剖析,为我们理解音乐艺术的演进提供了独特而深刻的视角。

莫扎特与贝多芬,这两位音乐史上的巨擘,虽处于相近的时代,却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音乐风格。莫扎特的音乐,常被形容为清澈的溪流,洋溢着优雅、和谐与完美。他的作品如同精美的艺术品,每一个音符都恰到好处,充满了古典主义的平衡与对称。以他的歌剧为例,《费加罗的婚礼》中欢快的咏叹调、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出生活的美好与人性的光辉。莫扎特擅长在旋律中融入丰富的情感,却又能保持整体的和谐统一,使听众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诗意的世界。他的音乐风格深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贵族阶层对优雅艺术的追求,使得莫扎特的作品注重形式的完美和技巧的精湛。在他的音乐中,我们能感受到一种无忧无虑的愉悦,即使是在表达悲伤时,也带着一种克制的美感。

相比之下,贝多芬的音乐更像是汹涌的海浪,充满了激情、力量与冲突。他打破了传统音乐的束缚,将个人情感和对命运的抗争融入作品之中。侯麦在书中指出,贝多芬的音乐具有强烈的主观性,他的《第五交响曲》《命运交响曲》开篇那震撼人心的“命运敲门声”,仿佛是他对命运不屈的呐喊。贝多芬在创作中不断挑战音乐的极限,扩展了交响曲的规模和表现力,使音乐更具戏剧性和张力。法国大革命浪潮激发了他对自由、平等的追求,而他个人的耳聋困境,更是让他在音乐中寻求一种超越现实的表达。

莫扎特与贝多芬音乐风格的对照,不仅体现了两位音乐家个人的创作特点,更是音乐史上两种不同审美取向的代表。莫扎特代表了古典主义的优雅与和谐,而贝多芬则开启了浪漫主义的激情与个性表达。侯麦通过对两者风格的深入剖析,让我们看到了音乐风格演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背景的深刻影响。在《从莫扎特到贝多芬》中,侯麦深入探讨了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对这两位音乐家创作的影响,揭示了时代与艺术之间的紧密联系。

启蒙运动倡导理性、自由和平等的思想,这种思潮在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中都有所体现。对于莫扎特来说,启蒙运动的影响体现在他对人性的关注和对自由表达的追求上。他的音乐作品中充满了对人性美好一面的赞美,以及对社会和谐向往。例如在《唐璜》中,莫扎特通过音乐展现了人性的复杂性,唐璜这个角色既有放荡不羁的一面,又有对爱情的渴望和对生命的热爱。莫扎特用音乐表达了对人性的理解和宽容,这与启蒙运动所倡导的人文主义精神相契合。贝多芬的音乐中充满了对命运的抗争和对自由的渴望,这种情感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激励着人们追求自由和正义。

侯麦通过对时代背景的分析,让我们看到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不仅仅是个人的创作,更是时代精神的反映。音乐不再是孤立的音符组合,而是社会、文化、思想等多种因素交织的产物。莫扎特和贝多芬生活在社会变革的重要时期,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思想冲击,促使他们在音乐创作中表达出对自由、平等、人性等问题的思考,这也使得他们的音乐作品具有了超越时代的价值。

侯麦在《从莫扎特到贝多芬》中,展现了他广阔的艺术视野,深入探讨了音乐与文学、绘画等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关联。他认为,不同艺术形式虽然媒介不同,但在表达情感、传达思想等方面有着共通之处,而且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影响。作为一位著名的电影导演,其以独特的导演视角对音乐进行解读,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理解音乐的方式。他将电影艺术的一些理念和方法应用到对音乐的分析中,使我们看到音乐与电影之间的潜在联系。

电影通过镜头语言来表达情感和思想,侯麦在分析音乐时,也注重音乐中的“语言”。他认为音乐中的音符、和声、调式等元素就如同电影中的镜头、画面和色彩,能够传达出丰富的情感和意义。比如,莫扎特音乐中常用的明朗调式和优美旋律,传达出一种乐观、愉悦的情感,而贝多芬在一些作品中使用的不和谐和弦和强烈的节奏变化,则表达了他内心的挣扎和对命运的抗争。

埃里克·侯麦以导演的独特视角,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理解音乐的方式。



生活中的伦理课

□陆远

伦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火车司机难题”。假设你是一位司机,在驾驶火车飞驰的途中,发现前方有五个孩子无视警告标志正在轨道上若无其事地玩耍。你尝试着边鸣笛示警边踩下刹车,可都无济于事。你感到无比绝望——如果列车冲向孩子,他们将必死无疑。突然,你发现右前方有一条已经废弃的岔道,岔道上也站着孩子,不过只有一个人。只要动一下扳手,让火车拐向岔道,就可以用牺牲一个人的代价,挽救五条生命。

你会怎么做?

相信许多人会支持让列车改道的做法,因为乍看上去,五条生命的价值似乎要“高过”一条生命。然而再仔细想想,你会发现,做出任何选择都会面临某种伦理上的困境。比如,生命的价值,能否简单地通过数量的多少来衡量?比如,规则和生命之间,究竟以何者为更高的价值原则?等等。围绕这一核心假设,伦理学家们又构想出种种特殊的场景,彼此聚讼纷纭,既发人深思也令人挠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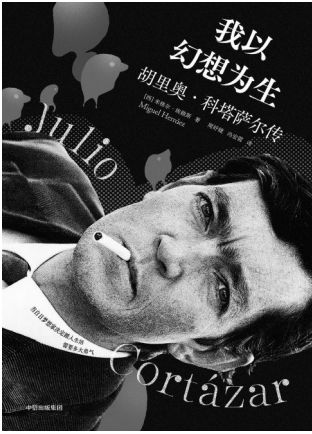
不过别担心,这只是学者假设的思想实验,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也不会真正陷入这种尖锐而激烈的困境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普通人就不需要进行更深刻的生命伦理思考。事实上,在忙忙碌碌柴米油盐之外稍微抽一点时间,想一想“生命中那些重要的事”,不仅是现代人的思想权利,也是一种道德义务,就像澳大利亚籍思想家彼得·辛格告诉我们的那样,日常生活的琐碎小事中,往往包含着生命和宇宙的重大关怀。

辛格是20世纪英语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伦理学家之一。什么是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事”,在不同人心目中,这个问题的答案一定大相径庭。对于辛格来说,重要的事既关乎每个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的“小确幸”,也关乎全球治理、人类命运、物种平等和星际宇宙之类的“大哉问”。与那些不屑于为普罗大众进行“科普式写作”的大学者不同,辛格似乎格外青睐大众媒体上的“豆腐块”。从2005年开始,他为“报业辛迪加”等报刊撰写专栏,围绕时事热点,用每篇千把字的篇幅,简明扼要地阐述相关的伦理学思考。相比起那些学院式的高头讲章,这样精炼的通俗短文往往具有多得多的传播度和影响力,《生命中那些重要的事》就是这些文章的集结。就像本书副标题注明的那样,这72篇短文就像72堂伦理课,带我们从日常生活的某一个小小切口进入,窥探和思考从人生到宇宙的大问题。全书依照主题分为11编,举凡“论超越生命神圣的伦理理念”“论生物伦理与公共健康”“论性与性别”“论幸福”“论政治”“论科学与技术”“论动物”“论行善”“论全球治理”“论生活、娱乐和工作”等,几乎涵盖了当下人类社会伦理困境的方方面面。而对读者来说,惊喜之处在于往往能同时收获轻松愉快的阅读体验和会心不远的突然感悟。

比如,在本书开篇《一个淡蓝色小点的价值》中,辛格援引伯特兰·罗素写道,现代天文学告诉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星球不过是广袤宇宙中无足轻重的一粒尘埃,但这样的科学事实不仅没有令人类沮丧、虚无,反而更加衬托出那句名言的意义:“人类只有看到自己的渺小,才能成就他所能成就的伟大。”在《明目张胆的仁慈》中,辛格支持那些“高调慈善”的行为,因为获得公众的认可,本身就是值得肯定的行善动机,更何况这样最终可以带动更多人投身慈善事业,相比“无声的给予”,也许“把善行大声说出来”更有利于推动一个健康社会的到来。在《后继无人?》中,辛格对提醒人们深思生命延续的意义,尽管人生实苦,但这是否能成为我们放弃生育下一代的理由?或者说,对于“人生究竟值不值得”这样问题,上一代有权为未出生的下一代做决定吗?在《机器人的权利?》中,辛格围绕人工智能与人类未来关系提出与主流观点截然相反的观点,足以震惊世界,在他看来,“更加现实的担忧并不是机器人会伤害我们,而是我们会伤害他们。……如果机器能够并且确实变得有意识了,我们会考虑他们的感受吗?”因为“迄今为止,我们与所遇到的唯一有感知能力的非人类生物——动物之间关系的历史表明”,人类尚未学会真正平等地对待另外一种有意识的生命。

翻读这些篇章,我们在惊叹作者思维广度和强度之余,或许更加能认识到,尽管今天文明世界的大多数人都能够承认和尊重个体生命至高无上的价值,但如何全面和深入地理解这种价值,依然是一堂终身的必修课。

我
思
我
在



写短篇小说从科塔萨尔开始

□思郁

本周文学圈最大的消息,毫无疑问就是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4月13日去世,享年89岁。略萨的文学成就有目共睹,拉美文学“大爆炸”中的四大主将之一,创作生涯高达五十多年,写小说,写评论都是一把好手。在他的同行好友都已经去世多年的情况下,他依然笔耕不辍,佳作不断,2019年还出版了野心勃勃的长篇力作《艰辛时刻》,2023年才宣布封笔。他的离世代表了拉美文学“大爆炸”的终结时刻,这个时刻会让我们联想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马尔克斯、富恩特斯、科塔萨尔。

在得知他去世消息的时候,我恰好正在阅读胡利奥·科塔萨尔的传记《我以幻想为生》。要知道,拉美文学“大爆炸”中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方在于,你几乎看不到文学同行们的嫉妒和诋毁,只有美好的友谊。他们互帮互助,称赞对方,帮助对方出版作品。哪怕到了后期,因为政见不同,很多人已经有了分歧,但是在文学成就上,他们之间只有互相的敬重和友谊。像略萨和马尔克斯因为一计重拳决裂,但是他们之间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敬意。在《我以幻想为生》中,作者米格尔·埃赖斯也着重强调了这一点:“从一开始,这些作家之间大都建立起了友谊。比如科塔萨尔、巴尔加斯·略萨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三位作家在巴黎相遇,略萨与科塔萨尔的关系尤为亲密。”

这几位拉美文学的巨人,如果按照一般的影响力排名,大概马尔克斯的影响力最大,一本《百年孤独》奠定的文学史地位无法撼动;科塔萨尔的存在感最弱,他年龄最大,成名相对晚,自有一种忧郁的气质,擅长写游戏和幻想故事。

读《我以幻想为生》的时候,更是加深了这种存在感薄弱的印象。科塔萨尔1914年出生,1984年去世。七十年当中,前五十年几乎默默无闻,直到1963年夏天《跳房子》出版后,才真正成为知名作家。

他生性热爱孤独,为人低调,身材高大,有一米九三,但是长着一张娃娃脸,体弱多病,热爱幻想,喜欢阅读、爵士乐、养猫。他朋友不多,当过教师,以翻译为业,一直在联合国文教组织担任翻译员,业余时间写作。他的作品不多,但是非常有特点,超现实主义的风格,非常适合短篇小说的写作。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些短篇小说,让我意识到科塔萨尔的影响力被低估了,他的短篇小说是一座待发掘的金矿,时间越久,越能探索其中的文学价值。但是从当时来说,真正让他具备世界影响力,成为拉美文学“大爆炸”中核心人物的是他的长篇小说《跳房子》。

这本书意义重大,在多方面改变了科塔萨尔的生活,用埃赖斯的话总结就是:“《跳房子》是一道分界线,它不仅意味着作家概念的变化以及与此已经形成的世界的关系的转变……还标志着他社会关系的变化。”这句话很有意思,前半句指的是科塔萨尔的前半生,作为一个业余写作者,默默忍受孤独,通过翻译、阅读和旅行丰富自己阅历,不断积累自己的写作经验。但是《跳房子》出版后,一切都变了。在这之前科塔萨尔的小说出版后只有很少的销量和关注度,而《跳房子》出版后,短短时间内,媒体上一窝蜂涌现出来几百篇的评论文章,科塔萨尔一跃成为了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引发了拉美同行的关注,拉美文学“大爆炸”的前期就是略萨的《城市与狗》和《跳房子》出版。

另外,当科塔萨尔文学地位开始变化之时,也是他身上知识分子的意识开始觉醒之时。

但科塔萨尔从来没有因为政治毁掉友谊,也没有浇灭内心对文学的热爱。他在晚年加入了法国国籍,在巴黎生活,热爱旅行。最后一本书就是跟他的第二任妻子卡罗尔·邓洛普共同完成的《宇宙高速驾驶员》,记录他们夫妇一个月高速公路上的自驾游。这本书出版前,他的妻子去世,新书出版后,1984年2月24日,科塔萨尔因为白血病去世,安葬于蒙帕纳斯公墓。

近些年,我反复阅读科塔萨尔的短篇小说,越发认为科塔萨尔的小说是无数写作者可以学习的典范之作。如果你热爱写作,建议你从短篇小说开始,如果你想写短篇小说,建议你从科塔萨尔开始。

远
见
近
拾

北
园
书
话